

妇女、时间与生育

周云¹ 郑真真²

(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28)

摘要: 关于时间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但少有人从时间特性的角度考察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人们更少从生育这一生活事件看待女性对时间的把握。本文利用已有文献和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全国数据,讨论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观念的差异和女性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特质。文章还重点分析了生育给女性生活造成的传统和现代时间交替出现的现实,指出在分析中国妇女生活与工作平衡问题时,应考虑平衡背后的时间观念和时间价值的问题,重视现代社会中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并存且相互争夺的现实。

关键词: 传统时间; 现代时间; 时间利用性别特点; 女性与生育

中图分类号: C 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5)05-0143-09

有关时间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时间的源头被认为是迪尔海姆、莫斯和休伯特对“集体生活的自然节奏”的研究^①。而索罗金和默顿则开创了时间社会学的研究先河^②。中国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例如王雅林于1980年和1988年在黑龙江进行的研究,王琪延于1987年对北京居民的研究,朱楚珠于1995年利用时间配置理论模型研究农村妇女的时间利用等^③。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经常进行有关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例如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自1976年每5年进行一次人民生活时间安排的调查;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03—2012年间开展过“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中国近年来的不少社会调查中也有时间利用的内容,如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年曾对中国10个省市15—74岁人群做过专门的时间利用调查,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自1990年以来进行过三次大型

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中包括了一些时间利用的问题(2000、2010)。这类调查提供了大量有关时间分配方面的信息,也使对分配和利用个人和社会时间的分性别研究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的特点入手,讨论现代女性时间利用特点,说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男性更多穿梭于两类时间之中;之后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全国数据,考察生育对女性的工作和生活时间安排的影响。全文将展示生育及养育子女对女性日常生活时间挤压的特点及程度,说明由于中国正规就业的制度安排在时间上缺乏灵活性,广大女性在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不得不付出个人劳动负担增加和个人休闲空间压缩的代价。

一、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观念

不同人群往往有其自己的时间系统,“计时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周云,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与个体生育意愿研究”(项目编号:13JJD840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ZH020)。

① 哈萨德·约翰《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 索罗金·皮蒂里姆、默顿·罗伯特《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41—53页。

③ 石红梅《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系统在每个文化中都是实践和情感的需要”^①;例如在美拉尼西亚群岛西南部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土著人界定时间的依据是天文(星星、太阳和月亮)、气象(风向和气候上的周期变化)以及文化(基于人们的季节性活动)因素。

时间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分类说法。相对于现代时间,传统或自然时间的特点是以自然变化为时间坐标系,时间变化界限模糊、时间计量上难以量化、无统一的标准时间^②。传统时间系统中,时间的衡量并不精确,人们对时间(例如月份个数)的计算不明确。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岛土著人的一年有10个或12个阴历月,有人甚至会给出13个月的回答。很多人说不出阴历月份的名字,大多数成年男性能够数出一些阴历月份的名字,但会漏掉几个,或者在顺序排列上有误。这种模糊概念不是因为他们记不得、数不清月数,而是因为10或12个月数更符合他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需要^③。他们不需要对月份、时间有精确的考虑。与此相似的是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那里的人们虽然拥有时钟(闹钟和手表),但从不担心或进行时间计划。“忽视时钟……的时间专制,从容不迫地劳动。今天完不成的劳动就留到明天”。时钟仅仅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计时方式更为精确的参考体系,但并不是人们生活中依靠的时间体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吃饭、约会、看医生)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主观体验到的时间间隔并非相等和统一”;人们会不屑时钟时间,把代表着现代时间的钟表称作是“魔鬼的磨坊”。人们顺从自然,也顺从与自然节奏合拍的

时间安排^④。这说明在传统和农业社会中,人们把现代时间或钟表时间看作是束缚或者控制传统生活的元凶。人们看重的是容易被当事人理解、工作和生活时间界限更为模糊、更被崇尚物理时间人们看作是浪费时间和没有紧迫感的“任务中心”的时间观^⑤。

现代时间的产生与宗教信仰和16世纪以来生产方式变化有关,前者较后者更早出现,后者的决定作用却更强;手工工场和制造厂的发展推动了现代时间的形成与发展^⑥。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钟表时间观念已经开始形成。中世纪英国的修道院和城镇已经开始更加准确地计时,人们有更加准确的时间感;在那里,更为精确的“商人时间”开始取代“教会时间”;从1550年到1750年,人们的时间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为资本主义时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基于对现代时间的理解与认识,与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关于工作日时长的斗争。在现代工业范围内“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⑧。

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线性时间被强化与巩固。人类的价值开始依据时间来衡量,时间是客观、同质、有限的;时间已经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可以带来特定价值的资源。它与其他各种需求(包括金钱)之间存在了交换的可能^⑨。在这一进程中时钟扮演了一种管理与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角色。学校教育和钟表产业及贸易的发

①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计时方式》,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202页。

②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第21页。

③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计时方式》,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212、214页。

④ 布迪厄·皮埃尔《卡比尔人的时间观》,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219—221页。

⑤ Thompson, E. P., “Time, work -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Past and Present*, 1967 no. 38, p56 - 97.

⑥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第20—33页。

⑦ 恩里夫特·奈杰尔《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98—102页。

⑧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⑨ 哈萨德·约翰《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14页。

展也推动了现代时间在不同社会扎根与发展^①。当大小不同的时钟时间单位被赋予越来越多和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经济价值时,日常生活就越来越是精密时间结构中的一环,而不再具有传统或农业社会中依据自然时间而安排的悠闲甚或是不确定性^②。

然而应该看到,在工业社会中,文化的时间结构仍以不断循环或周期性的方式重复出现(如每日事务、每周常规和一年四季);大多数的机构组织却是按照线性的时间来操作和运作的,因此人与物穿梭在线性与周期循环的时间框架内。但在社会中,几种时间有优先顺序;一个社会人必须遵从这一顺序规则:组织时间 > 互动时间 > 自我时间^③。个体层面的自我时间被置于整个社会时间结构的底层,从而造成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活与社会组织的运转产生摩擦或矛盾。女性对此的感受更为明显,因为传统的循环时间常被与女性联系在一起^④。

二、女性与时间

女性的生活总是在传统与现代时间中交替出现。女性的许多角色都遵从典型的传统时间。家庭事务中的家务劳动可被看作是传统时间的贯彻和落脚点。每个家庭都要面对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家人生存的根本。然而家务劳动的时间特点是传统或周期性的。例如做饭就包括采购、准备、烹饪、食用及后续的收拾和清理,它形成了一个从原点回到原点的周期。人们对家务劳动的成就感也就体现在送走一个周期迎来一个周期中。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将这一个周期当作成就感的体现;相反,比较社会职场中的成就,家务劳动的

周期常会令人沮丧,因为一旦周期回到原点后,人们多少会有“零”成就的感觉,且这种周期没有上升(相比社会职场中的职位晋升)、哪怕是螺旋式上升的可能。

家庭事务中的生育对妇女也是一个周期性、相对独自承担的工作,但其周期相比日常家务要长得多,常以子女的成长和自己的生命为参照点。生育与养育期间的很多内容是不考虑现代时间特别是钟表时间的。人们可以计划生育,计划在一个阶段或年龄上怀孕生子,但这一计划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没有联系。女性生产之后的生活更多依靠传统或自然的时间来安排。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妇女喂养小孩,不是以特定时间间隔为准,而是以小孩哭闹为喂奶的信号^⑤;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有关母乳喂养的建议要点之一,就是母亲应当在儿童需要时进行母乳喂养,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⑥。养育子女这一重要的家庭事务将女性更多带进传统时间,也就是时间的计算和利用上不是理性、匀速和边界明确的。由于现代社会中的工作还存在着性别差异,家庭事务依旧有性别分工,因此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以往有关性别与时间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从不同的角度看时间分配上的性别差异。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男女在时间利用上确有差异,女性总体劳动时间超过男性,婚姻改变着男女时间利用的趋势^⑦。影响男女两性的生活与工作时间分配的因素有个人基本特征、婚姻状况、有无工作、从事的职业类别、教育程度、子女等。在东京与北京的研究中,王琪延衡量性别差异的角度是男女

① Thompson, E. P.,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Past and Present*, 1967, no. 38, pp. 56 - 97.

② 刘易斯 J. 大卫、韦加特 J. 安德鲁《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 73—74 页。

③ 刘易斯 J. 大卫、韦加特 J. 安德鲁《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 72、80 页。

④ Kristeva, Julia, "Women's time". in *Signs*, 1981, v. 7(1).

⑤ 布迪厄·皮埃尔《卡比尔人的时间观》,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 219、221 页。

⑥ “母乳喂养” http://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topics/newborn/nutrition/breastfeeding/zh/ (2015-3-15).

⑦ 杨菊华《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1990—2010 年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人口与经济》2014 年第 5 期。

各种活动平均时间的差值,并利用这一差值生成“不平等指标”,也就是男女各项活动时间差值绝对值的累加,来考察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①。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数量也是研究关注的一个角度。例如,石红梅针对福建资料的分析说明,生育一个孩子的母亲工作时间最长,孩子数量的增加导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直线上升和闲暇时间的减少^②。在工作日,有子女只会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对男性影响不大;在休息日,有子女的男性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比没有子女的男性略多,但增加的幅度远低于女性^③。在业男女中,无论处于哪种婚姻状况,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比男性长。但职业层次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受制于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对短;而有学龄前子女的母亲家务劳动时间增加明显^④。

城乡不同人群、年龄、家务劳动量也是人们研究的内容。例如有人从时间节奏和时间分配角度考察城郊女性一周时间利用特征^⑤;或针对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进行性别特征方面的研究^⑥。从农村地区人口流动的角度看,当家庭中丈夫外出打工时,其妻子在农业劳动上的投入增加,但家务劳动时间没有过多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家中其他成员(如年幼或年轻子女和家中老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地区家庭成员担当不同类别生产和家庭活动的时间分配^⑦,同时也导致女性用于家庭经

营劳动、有酬劳动和家务劳动三类活动的时间总和比男性高出25%~56%^⑧。家务劳动的参与趋势和特点导致男女在休闲活动方面有差异。山东男女除在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上有差异外,休闲行为也不同;女性在休闲领域除探亲访友的比例高于男性外,读书看报、体育锻炼、旅游、外出就餐方面的比例均低于男性^⑨。

有关家内和家外劳动量的平衡及相应报酬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相对男性的过量投入导致其在工资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⑩。然而,女性参与家外有酬劳动并不意味着家务劳动的减少^⑪,女性的劳动负担常因为有酬工作与家务劳动而更加繁重。家务劳动承担量与年龄变化相关。例如,女性参与家务劳动自21岁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年龄越大的女性明显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务劳动;中老年女性照料年长家人和孙辈的现象普遍^⑫,从而挤占了中老年女性用于自身休闲或其他活动的时间。

国内学者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不过,近年来针对男女时间安排差异的研究更多是从工作-生活平衡的角度或假设入手,但少有从传统与现代时间的特性考虑男女时间分配的差异及其深层原因。此外,多数研究从男女时间利用的差别入手进行分析;很少有针对子女数量不同的女性生活时间分配的具体研究,从而难以说明生育对女性生

① 王琪延《北京和东京男女生活时间差异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② 石红梅《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研究》。

③ 李亚妮《生活方式与妇女地位》,参见宋秀岩、甄砚《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450页。

④ 杨玉静、郑丹丹《婚姻家庭中的妇女地位》,参见宋秀岩、甄砚《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第324—390页。

⑤ 柴彦威、张雪《北京郊区女性居民一周时空间行为的日间差异研究》,《地理科学》2014年第6期。

⑥ 兰宗敏、冯健《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时间利用以及生活活动时空间结构》,《地理研究》2010年第6期。

⑦ 畅红琴、董晓媛《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留守家庭成员时间分配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源》2009年第4期。

⑧ 畅红琴、董晓媛、Fiona MacPhail《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

⑨ 王毅平《尚未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山东女性生活方式管窥》,《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2期。

⑩ 付光伟《城镇正规就业女性家务劳动与工资收入关系研究》,《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⑪ 转引自畅红琴、董晓媛、Fiona MacPhail《经济发展对中国农村家庭时间分配性别模式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12期,第78页。

⑫ 郭砾《生命周期视角下女性的时间配置及制度性影响因素》,《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活时间的挤压状况。而已婚女性在生育阶段往往不得不穿梭于传统与现代时间,她们的时间分配现状、趋势与特点对社会的发展和妇女自身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会影响到女性的劳动参与、个体的生育意愿以及家庭的稳定等。鉴于社会延续过程中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角色和生理差别的现实,我们有必要深入透视现代社会中生育给女性群体带来的时间挤压问题。

三、女性生育与两种时间的较量

在时间有传统与现代时间或社会与个人时间之分的背景下,重视和强调社会时间或有价值的社会时间时,个人的时间往往被挤占与牺牲,因为其价值不能被量化、不能显示出社会价值。时钟或物理时间呈现出“难对付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侵占其他的时间领域”^①。女性的生育正是这种个人或自然时间被挤压的例子之一。

生育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产品所给予的价值远远高于“生育”这一社会生产所带来的价值^②。生育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事件,它更意味着女性在生产与养育子女中要用掉更多个人的时间和精力^③。然而当女性可以通过有效的避孕手段决定生育时间时,生育并不意味着女性无法加入市场劳动。因为一旦女性可以掌握生育时间,雇主会意识到女性在工作时间量上的投入是可预测的,因而在薪金支付上更趋于正常或平等^④。但这依旧改变不了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期望利用调查数据说明,生养子女确给女性时间安排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体现了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相互较量。

1. 研究假设及资料来源

根据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在此做出一个基本假设,即女性在养育子女期间处于传统与现代时间的严重挤压中,有无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在其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上显现出差异。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资料,从女性工作日、休息日的分配以及女性对家庭与事业发展的态度等角度,分析女性的时间安排差异。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是继1990年和2000年后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又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共回收18岁以上个人有效问卷105573份^⑤。本研究在具体分析对象的选取上两点考虑。首先从女性的生命历程角度考虑,女性结婚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后,在工作和家庭生活时间安排上会与未婚妇女有明显差别;已婚妇女生育后,无疑会将更多时间用于照料子女;而当子女长大成人离家后,女性应当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如果所有女性都在20岁以后结婚,那么40岁以下的妇女大多数会有未成年子女。由此,我们将分析对象限定为40岁以下已婚妇女。其次,从女性就业状况考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日常生活与工作具有遵从传统时间的特点,如劳动任务的自然依存性和时间分配上的相对灵活性。与务农群体形成对比的是城市里的劳动者。城市妇女一旦在家外参与社会工作就必须遵从工业化社会严谨的现代时间,穿梭在现代与传统时间指导下的生活中。城市已婚妇女中有一部分是流动者;她们往往将子女留在家乡,与丈夫一同或独自在城镇打拼;具体的日常养育子女事务对在城市工作的她们影响甚微,因此本文没有

① 刘易斯 J. 大卫、韦加特 J. 安德鲁《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81页。

② Folbre, Nancy, “The future of the elephant-bird”,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7, v. 23 (3).
McDonald, F. Peter, “The shape of an Australian population policy”, in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2000, 33(3).

③ McDonald, F. Peter,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0, v. 26(3).

④ Presser, B. Harriet, “Comment: A gender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low fertility in post-transition societies”,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v. 27 (supplement): 179.

⑤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http://www.china.com.cn/zhibo/zhuanti/ch-xinwen/2011-10/21/content_23687810.htm 2015-3-6 获取。

选择居住在城镇的流动者。基于这两点考虑,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为40岁以下、已婚、非流动的城市女性。

调查问卷中要求受访者回忆调查前一天用于各种活动的时间长度,这些活动包括有收入的工作、学习、工作或学习往返路途、家务劳动(包括做饭、清洁、照顾家人、日常采购等)、看电视、其他休闲活动、睡觉。在具体时间利用特点的分析时,本研究采用的是时间四分法,将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学习以及工作学习往返路途三类活动合记为经济活动,家务劳动为第二类,将看电视和其他休闲活动合并为第三类为休闲活动,第四类为个人休息,即包括午睡在内的睡眠时间。在这四类时间中,经济活动时间属于现代时间,由于经济活动一般都有规律且往往边缘明确,在时长估计上也应当是相对准确的。其次比较有规律性的应是个人休息时间。家务劳动属于传统时间,因劳动的碎片化特征,在时间估计上可能会相对含糊。休闲时间兼有现代与传统的特征,取决于具体休闲活动,如一部电视剧或一场演出会有较为固定的时长,而读书或一盘棋局则可长可短相当灵活。

调查获得的时间单位为分钟,为易读起见,本文在具体分析时将分钟换算成“小时”,以“小时”为分析时间的单位。

2. 主要分析结果

符合本研究分析对象的40岁以下城市非流动已婚妇女共有1825人。她们在婚姻、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从事职业方面有以下一些特点。由于城市妇女结婚相对较迟,被调人群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25岁以下占3.5%,25—29岁占16.8%,30—34岁占32.0%,35—39岁占47.7%。这个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上为主,只有极少数仅受过小学教育或不识字(占4.3%),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24.3%,高中或中专的占31.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39.6%。大部分妇女(75.9%)都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劳动;调查时未参与劳动的受访者多数曾经工作过(占68.7%)。未参与劳动的妇女主要是在料理家务,占未参与劳动者的78.6%。她们未工作的原因有91.9%是因“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共306人,占到本研究样本的16.8%)。当前有工作或

曾经工作过的妇女职业结构,比例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34.9%),其次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22.1%)、办事人员(15.5%)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14.1%)。

有关生育和子女照料问题,这组妇女中大多数已生有一个孩子(81.0%),没有孩子的占8.4%,有两个孩子占10.0%,只有极少数人有3个或4个孩子(11人)。子女中绝大部分在16岁以下,最小子女年龄在3岁或以下的占24.0%。大部分妇女最后一个孩子在3岁以前的白天照料都主要由本人(占46.4%)或父母公婆(占47.7%)承担,由其他人照顾或上托儿所的情况极少;但93.1%的孩子在3岁以后都上过幼儿园。

本文在考察个体日常生活中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挤压状况时,主要分析了妇女用于具有传统时间特征的家务劳动和带有现代时间色彩的社会经济劳动的时间长度。分析结果说明,有上述个人和生育特征的妇女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分量以及每日时间分配上有类别差异的特点。接受调查的已婚城市妇女,无论其目前是否在工作,都承担了相当多的家务劳动。在有孩子的妇女所报告的近一年承担家务劳动情况中,无论子女年龄大小,大多数妇女都说自己承担了一半以上照料孩子生活的家务(见图1)。照料内容可能会随子女长大而有所变化,但妇女主要承担这项劳动的状况一直到子女成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而包括照料子女在内的家务劳动特点是随意、随时、无法量化、无法以社会价值来衡量,更不被社会所承认,因为社会需要和承认的是在现代时间体系下能提供有价值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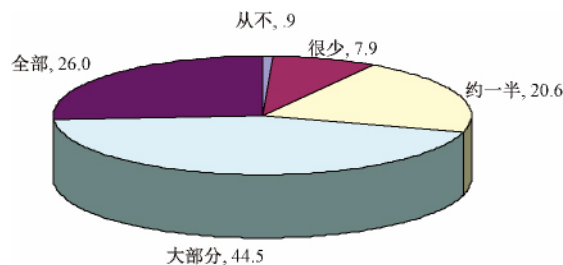


图1 有孩子的妇女近一年承担家务劳动情况：照料孩子生活(百分比, N=1666)

图2分别显示了已婚妇女在每日时间利用上,有子女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图2a是关于

妇女工作日的时间分配状况,其内容说明的是在一个工作日中女性参与四大类活动所用的小时数。与无子女的妇女相比,有子女的妇女平均用在经济活动、休闲和休息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家务劳动时间相对较长。女性在工作日用于经济活动的时间普遍多于 8 小时,这与我们将上下班的时间归于经济活动类别有关。没有子女的女性比有子女的妇女经济活动时间略多一些,但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少于有子女的妇女。有两个子女的妇女比有一个子女的妇女要多做半个小时的家务。从休息时间看,相对于无子女的已婚妇女,有子女的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挤占了其休闲和睡眠时间。而且,相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有两个孩子的妇女的经济活动时间明显减少,家务劳动量增加,个体休闲时间和个人休息时间被挤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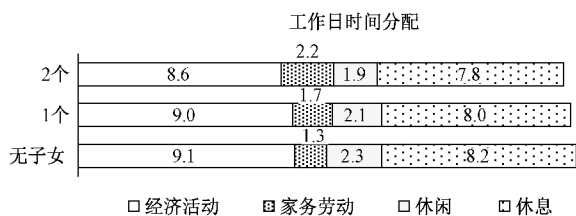


图 2 a 按子女个数分 40 岁以下已婚妇女工作日的分配(平均值,单位:小时, N = 1129)

在休息日(图 2b),被访女性无论有无子女都大幅度减少了经济活动,但她们的依旧会用 1-2 个小时做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其中可能包括了学习充电,也不排除适当的加班。无子女的女性在休息日用于经济活动的时间相对更长。相对而言,有更多子女的女性在休息日要做更多的家务。从休闲和休息角度看,无论有无子女,休息日被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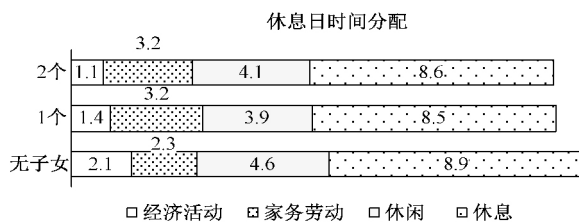


图 2 b 按子女个数分 40 岁以下已婚妇女休息日的分配(平均值,单位:小时, N = 272)

注:因调查时要求所有时间合计少于 24 小时,但不要求合计刚好为 24 小时,所以四类活动平均时间合计只会少于 24 小时。

女性都会拿出更多的时间休闲和休息,尽管依旧能够看出有子女的女性休闲和休息的时间相对较短些。从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参与量与各类时间分配的特点,确实表现出女性在养育子女的一生和每一天中都为子女和家庭投入了大量时间。这些时间是参与不同劳动和活动的传统与现代时间的混合。

当一天的时间是一个定数 24 小时的情况下,各类活动相互挤占其他类别活动所用时间,从而使得女性的生活充满挑战。考察妇女时间安排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分析女性是否愿意主动放弃受一种时间规定的生活,冲出不同类别时间所挤压的生活框架。或者,她们是否愿意只在一种时间支配下生活,例如或生活在传统时间下全身心从事家务劳动,或是工作在社会岗位、更多投入经济活动中。从妇女针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来看,尽管她们因照看子女用掉自己的大量时间,但多数人不愿意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表 1 显示有无子女的女性在家庭-事业发生冲突时个人的意愿或选择。

表 1 曾否有过为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的情况(% N = 1377)

子女数	从不	偶尔	有时	经常	频数
0	62.5	26.6	7.8	3.1	128
1	56.5	23.9	14.6	5.1	1144
2	54.5	24.8	11.9	8.9	101
3	-	-	-	-	4
合计	56.9	24.2	13.8	5.2	100.0

总体来说,平均有超过 40% 的妇女报告自己或多或少曾经历过这种两难选择。但显然有子女的妇女更多经历过为家庭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的情况。相对于有子女的妇女,仅有 38% 的无子女妇女曾遇到过家庭与事业冲突、传统与现代时间碰撞的问题。有子女的女性“有时”或“经常”因为家庭而放弃个人事业发展的相加比例达到了近 20%,高出无子女妇女的近 10 个百分点。生育成为妇女要面对的家庭与工作协调问题的诱因,成为女性如何协调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的人生事件。当女性生养子女、需要协调两者关系时,她们更多选择两者兼顾,在做好家庭内部工作的同时

不放弃在社会上的经济活动。因而会出现上述工作日和休息日女性时间安排的特征。

四、结 语

时间的分类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中的主导时间是现代时间,或者是物理钟表时间督导的现代时间。我们的生活已经深深地受制于时钟。生活被“机械的”时间结构化,机械的时间不仅独立于自然的节奏,而且时常与自然的节律相冲突^①。自然节律代表着传统时间,也存在于现代社会。因此,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依旧会体验到现代和传统时间对他们的影响。女性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她们因为对家庭事务的投入、因为生育而更多体验到两类时间的同时存在。应该看到,生养子女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或生活。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考察,女性生育后,其生活和工作时间相比男性会有更多的变化。特别是子女在生活和感情方面对母亲的依赖和求助会用掉女性许多时间,这种需求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女性也多会感到自己有责任满足其子女的各种需求^②。女性因生育而更多体验着传统时间。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女性一旦有了子女,子女在18岁之前的照料负担基本全部落在自己身上。中国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意识强烈,实际参与比例高,正规就业的劳动规则弹性小,同时又要满足家庭和子女需求,因此女性家务劳动(含子女照看)的时间来源是以挤占自身的休闲和休息时间为代价的。在一个崇尚时间、看重时间价值的现代社会中,家务劳动的价值却很少被社会甚至家人所承认。家务劳动的传统时间特性、其时间消耗特点也未被重视。因此在职且生养子女的女性需要平衡传统时间和现代时间主导下各类活动对自身的影响。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城市妇女虽然受到各类时间相互挤占的压力,但她们仍努力兼顾工作与家庭,并不会因为生育或家庭而放弃个人在社会上

发展的机会。这种观念代表了中国女性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倡导的潮流,却也使她们倍感和承受着日常时间安排上的压力。

当我们关注中国妇女工作与生活平衡问题以及日常各类时间安排的特点时,不可忽略这种安排背后时间观念和时间价值的问题,更应重视现代社会中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并存且相互抗争的事实。尽管男性也同样要面对这两种时间的冲突,但传统家庭分工使女性更要频繁地应对这种冲突,我们期望社会价值评估体系中意识到女性日常生活中时间付出的特性及其价值,给予更多受自然时间支配的女性以关心与认可。

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的变化能缓解当前许多女性所经历的自然与现代时间之间存在的冲突。例如,网络时代促使就业形式在变化;网店的流行将一些家庭再度变成工作场所,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或方便地处理家庭事务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正规就业能有更为灵活的时间安排(如每周四天半或四天工作,或每天6—7小时的工作时间等),在职女性就有机会分配更多时间照顾子女和用于自己的休闲生活。当然,人们的偏好已经显现出多极发展,社会也开始认可各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倡导女性(也包括男性)必须撑起家外的半边天。部分女性会更享受具有现代时间特征的社会职场上拼搏带来的快乐;部分女性则会在生育和养育期间更多留在家中,打理依传统时间出现和发展的家中事务。

当城镇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个人及家庭需求也将呈现出多样性。国家则需制定和完善更多家庭友好型社会政策,包括支持女性可成功养育子女和支持女性生育养育之后再就业的各类政策。当女性可处理好生育引发的现代与传统时间冲突问题,家庭成员间的各种关系会更为融洽。妇女不仅在个人发展上会得到更大空间,也将有可能在社会和家庭中都发挥更大的作用。

① 哈萨德·约翰《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参见约翰·哈萨德著,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第10、13页。

② Presser, B. Harriet, "Comment: A gender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low fertility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v. 27(supplement).

Females , Time and Childbearing

Zhou Yun¹ , Zheng Zhenzhen²

(1.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China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28 , China)*

Abstract: Time has been a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 few people have discussed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even fewer scholars have examined how females make use of time in such an event in life as childbearing. By using the existing documents and the nationwide data from the 2010 survey on Chinese females' social status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time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enses ,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s' use of time in their daily life. This article especially analyzes the reality in which childbearing causes the alternate occurrence of the use of time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enses in females' life.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hen we examine the issue of the balance between life and work on the part of Chinese females , we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 time behind this balance.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reality in modern society , where time in traditional sense and time in modern sense coexist , and sometimes they try to seize each other.

Key words: time in traditional sense , time in modern sense ,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time , childbearing

(责任编辑 管 琴)